

# 从农业与文明起源看文化基因的形成

——读《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

谷卿



非指谓农民无所作为、全凭自然赏赐，而是指农业生产必须在深入掌握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基础上开展，只有依照规律、“不违农时”，密切关注“天”的变化，据此指导农业活动，才可能有好的收成。因此，勤劳成为农业历史时期最具基因属性的品格。陈胜前指出，长期的农业历史还造就了更可贵的文化基因——包容与和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外欲求其实相当有限，“农业驯化了动植物，同时也驯化人自身”，以节制和容忍为核心的文明由此而生。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人文史，时时可见多元文明、异质文化交融的例证，摩擦和碰撞作为一种非常态和临时态，实是走向融合的必然途径，中国人不但适应了自然和环境，也选择和改造了自然和环境，从中我们看到文化基因在生成和变化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文化基因是历史的产物，不难看出它所具备的多元复杂性、物质决定性、独立存在性、长期稳定性和新生获得性，这些可以视为其“结构属性”。陈胜前在书中特意多次强调了文化基因是可以相互学习的，它的主要传递机制就是通过学习交流，这也是其与种族主义存在本质区别的原因。应该注意到，文化基因“可以努力去发现、去创造”的特性，寓示着它也具有需要被控制、优化的另一面，用作者本人的话说就是“正如自然的基因一样，有发挥重要影响意义的基因，也有大量的‘垃圾基因’”，我们需要分辨并有意识地避免那些负面意义的文化基因所带来的伤害。

也许会让一些读者感到意外，该书在讨论文明起源之外，视线还触及当下社会，消费、旅行、云直播……种种热点话题均被论及，这体现着作者深切的现实关怀。陈胜前一直不忘申

明其考古学的立场和视角，时时以“人与物的关系”观照古今一切事物。在他的理解中，进入近代工业文明社会以来，科学也逐渐成为中国新的文化基因；在经历了技术革命（自然）、社会革命（历史）、精神革命（人文）之后，种种新的文化基因得以创造，并且塑造着中国文化的整体形态。认识“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充分发扬其优秀部分，是形成文化认同、铸牢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文化建设的考古学，因其在构建当代中国自身文化力量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功能，使我们能以自信的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好地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从容应对新的挑战 and 风险。

可以感受得到，陈胜前对文明起源、文化基因的思考和研究，充满了文化情怀。文化基因作为一种理论，是进化论用于文化分析的产物，陈胜前并未将之视为一个比喻、一种工具，而是将其看做实际存在的对象，其出发点即在于他对文化的深刻认同和理解。人类与动物关键的区别在于文化，有文化使人成为人，有自己的文化则使人成为有自信、受尊重的人。陈胜前向读者特别提示也相当在意的“考古学视角”，实际也落脚在文化之上，他曾坦言：“文化也是考古学最关心的问题，无论是文化历史、过程还是后过程的考古学研究，文化都是其核心概念。”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提出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达成这一目标的核心即在于扎根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我们的存在于世的意义和基础”，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我们探寻文明起源和文化基因的根本动因。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基因”一词早已被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人们所习见、熟知和惯用。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担负着存储和传递遗传信息的重任，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决定性因素。

跳出生物学的语境，面对当前世界多种文化、多元文明的深度交融互鉴，我们开放的心态、比较的视野背后，深藏着希望探索寻根、形成和传承的系列文章，这39篇文字和书名标示的主题有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也是作者各时段从不同方面就不同对象对此主题进行探索的成果。当

然，这样的结构形式，难免会存在作者同一观点和近似论述在不同文章中重复出现的现象，但事实上这恰好提示了读者，作者想要强调的是什么，反复出现的内容也正是作者思考成熟、乐于广播的结论。在这本书中，陈胜前时时不忘谈论的一个背景关联是，农业与文明起源，而通读全书之后，我们也不妨为作者作出总结：农业起源时代文明体系对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就是文化基因。

正如书前言即已指出的，对中国文化基因影响最大的是农业起源与文明的形成，也就是整个农业时代，而“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我们常说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其基础也奠定于农业起源时代；中国有着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两个面积广大的农业起源中心，缓冲空间十分巨大，因此文明的形成也就不是一个单点生发而向周边扩散的模式，而是多点并发、逐渐融合。中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各区域文化习俗和形态多样，即以今日可见的现实也能够想象和认识到，史前时代文明无疑各具特色和体系，又各处于不同的发展进程。以“满天星斗”概括描述中国文明起源的苏秉琦先生曾直陈，在中国考古和历史工作者头脑中长期萦绕着两个怪圈，“一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旧观念；二是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苏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不仅是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分类，更是摆脱以往“中原中心论”束缚的认知革命与方法创新。在“满天星斗”的照耀下，我们得以重新发现中国文明起源的真实状态。陈胜前进一步谈到，“中国文明起源不是仅仅指某个中心化政权的形成，而是一个体系的形成，这个体系向外与周边更大范围的群体交流互动，向内逐渐形成了‘逐鹿中原’的趋

势”；“中国文明的起源首先是一个体系的形成，而不只是某个地方率先出现某些文明的特征”。由此判断看中国早期文明中的东西差异和后来历史中的南北关系，非常有意思，而“周边”文明在“实验结束”之后，中原地区则以其厚实稳定的农业基础发展出长盛不衰的文明。陈胜前的思考与分析，显然跳出苏先生所虑“两个怪圈”之外，在社会发展史之前，农业时代的自然格局决定了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但这些多元的“星斗”仍有向中心辐聚、融合、形成体系的趋势，一种基于现实而存在的向心力，正是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重要因素。

在《史前中国的文化基因》一文中，陈胜前尝试依据农业历史对中国人的影响，析论部分中国文化基因的史前渊源。所谓“靠天吃饭”，并

和内容。要尊重革命旧址原有景观和氛围，避免设施建设贪大求洋、富丽堂皇，导致革命传统教育走偏变味。

让革命文物“活起来”

《瞭望东方周刊》：“让文物活起来”是新时代文物工作的方针。在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的过程中，核心关键是什么？

顾玉才：要加强研究阐释、提炼转化、展示传播。挖掘价值是有效开展文物利用的前提，起到基础作用的是研究阐释。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必须在对文物价值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要强化政治引领，树立大历史观、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恰如其分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确保导向正确、史实明确、评价准确。在此基础上，要创新价值阐释，深入挖掘和准确提炼革命文物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纪念价值、教育价值、时代价值。

为开展系统研究，促成资源整合，国家文物局、教育部拟认定一批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由革命纪念馆和高校联合建设，将革命纪念馆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与高校的学术研究、教育资源等优势整合起来，从而打造具有创新性、示范性、引领性的红色资源研究高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高端智库、革命文化学术交流重要平台和红色资源共享中心。

在革命文化传播方面，除了开展云展览、主题宣讲、广电节目制播、红色展演等，还要拓展教育功能。目前，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已面向全国文博单位遴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实践教学基地100家。革命场馆也将深化拓展革命文物教育功能，设计符合不同年龄、不同群体认知特点的多样化主题教育活动，打造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品牌。

《瞭望东方周刊》：革命文物大多分布在革命老区，以革命文物工作赋能老区振兴也是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方面有何有益探索？

顾玉才：从现有经验来看，主要是在“融入”上求突破，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建设、旅游提质充分结合，与乡村振兴、老区振兴充分结合，与惠及民生、增进福祉充分结合，持续释放革命文物资源的优势和潜力。

例如，陕西延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通过多年的努力建设，在整体革命旧址保护利用水平大大提升的同时，28.9万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同时赋能了当地文旅产业，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当可观。江西实施的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程，通过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对革命文物进行集中连片保护，带动红色文旅发展，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改善了民生。这两个片区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刘佳璇

（上接1版）

中国百年来为何能完成沧桑巨变？答案要在历史中探寻。一座座纪念馆和一件件文物，真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血肉联系，记录了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奋斗和收获，使人们重温历史时有址可循、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有情可寄，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保护革命文物就是保存革命历史，做好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就是要展现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面临困境时的英勇不屈、顽强奋斗，展现好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进行的不懈探索。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如何在这一历史方位下理解革命文物工作的意义和作用？

顾玉才：立足当下，革命文物工作对坚定“四个自信”意义重大。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是历史经验的昭示，反映着中国人民在特定国情下的价值诉求和精神信仰。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能够有效引导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如何引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真切感受到我国制度日益完善、现代化建设道路越走越宽广的事实，从而自觉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着眼未来，革命文物工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着特殊作用。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强调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革命文物中蕴藏着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精神密码”，所承载的红色文化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内生动力因素。在瞻仰革命旧址时，人们能够受到直击灵魂的精神洗礼、体验超越时空的精神感召，这种身临其境所带来的真实感和震撼感，是文字描述和艺术表达所不能替代的。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都更加需要从革命的历程、先辈的事迹中汲取开拓前进的信心和勇气。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能够擦亮初心筑牢使命，使广大干部群众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不惧前进征程上的任何风浪、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系统性保护任重道远

《瞭望东方周刊》：既往的社会认知中，

革命文物主要来自革命时期。近年来，革命文物的保护范畴是否有了新变化？

顾玉才：从时间范畴上来说，革命文物突出“一条主线”“两个见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为主线，见证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救国兴国的伟大贡献，涵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因此，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程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历史价值、时代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均纳入革命文物保护范畴。

《瞭望东方周刊》：“加大革命文物保护力度”被列入国家文物局2023年工作要点。当前，革命文物保护还有哪些瓶颈需要突破？

顾玉才：革命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保护是前提和基础。目前，仍有许多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层级较低、产权复杂分散，其有效保护管理难度较大。

这些革命旧址建筑以农村中的民用建筑为主，已存在几十年、上百年，超过了建筑本身的使用寿命，需要进行修缮。在城镇化过程中，一些旧址建筑的所有权人或已离开农村，或是留守老人，多难以负担专业文物建筑修缮费用。大量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分布在刚刚脱贫的革命老区，如果进行整体腾退，则成本过高，对于地方财政来说压力较大。因此，加强革命文物的系统性保护仍然任重道远。

《瞭望东方周刊》：针对上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难题，破解路径何在？

顾玉才：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通过建立片区保护制度、实施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程、革命文物保护开创了新局面。目前，中央宣传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已公布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涉及31个省（区、市）228个市1433个县。

另外，通过提升保护级别，大量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保护情况得以改善。5年来，有823处革命旧址被核定公布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67处革命旧址的保护级别得到提升。

2023年，国家文物局将研究制定革命文物分类分级认定标准，并公布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工作规划，实施一批革命文物连片保护和整体展示项目。

守正创新用好红色资源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以革命文物来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尤其是新时代的故事？

顾玉才：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具有百年历史时间跨度的大故事，也是千千万万个小故事，这些小故事便蕴藏在革命文物